

## 社会学二重性：学术性与时政性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新视野》杂志社 刘秀秀

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评价，有两种声音不绝于耳：一方面，学者们指责一部分学术成果过于关注西方理论，因闭门造车而无法面对中国鲜活的经验现实，或者为了回应理论而肆意剪裁现实，更遑论有益启示；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对学界过于关注政策动向的倾向表达了不满，认为这些研究无非是政策解读，并不属于学术研究。其实，这两种批评可以归结为对学术性研究和时政性研究的争论。所谓学术性研究，是指研究以理论脉络为核心，做出的概念整理或事实验证，重视学术脉络的传承与对话；而时政性研究，则指研究针对国家或地方政策等所作出的解释、分析和应对之策。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就时而陌路，时而纠葛，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特色之一。

社会学研究兼具学术性与时政性

布洛维曾将社会学劳动分为公共社会学、政策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这种分类基于对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体认，能够较好地概括美国社会学的研究特色，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学研究分类亦有启示。布洛维对公共社会学的强调也是走出社会学研究困境的一条出路，因为它试图链接专家知识和公共参与。

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而言，用布洛维的四种类型进行剪裁也可以得到很多颇具价值的启发，但过细的分类容易模糊更多本质差异。就此而言，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的两分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社会学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并可在出路上提供一定启发。

社会学的学术性研究一般秉持科学的精神，致力于理论诠释或者经验对照。理论诠释，还原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核心主旨，面对中国现实，探讨其理论适用性；经验对照，切实引入中国经验，对理论进行证实或者证伪，以弥补或修复理论链条中的问题。这些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为知识积累和经验对照提供了财富。然而，其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由于西方理论源于西方现实，套到中国经验上实则“驴唇不对马嘴”，易造成理论与经验的“两层皮”现象；学者们为了回应经典或者对话理论剪裁中国现实，泯灭了经验材料的丰富性，成为理论的附庸。

社会学的时政性研究则力图摒弃套用理论的种种纠结，直接从政策指示出发，或者寻找其理论依据，或者以此来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前者追溯了政策精神的渊源及其发展，解释了其提出的内涵和意义，推测了其现实影响，为相关部门、研究者和群众提供参考；后者运用上级部门提出的概念观照现实，将问题套入分析，提出适合当下时政的解决之道。但是，时政性研究容易遭遇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为了给相关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容易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提出牵强附会的解释。

可以看出，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只是两种类型的研究，无非是关注点不同，并无重大分歧，本可以并行不悖。然而，事实上，两种研究取向都有其难以回避的病理学，如布洛维所言，互相攻伐的学者将对对方的病态问题当成了常规问题，这扩大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而对于相互理解缺乏耐心。

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密不可分

社会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与当时激烈变动的中国现实密切相关，解救民族危亡、探索富国强民之路便成为社会学的时代使命，因此，学科建设为现实服务的印记不可避免地打在社会学身上，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密不可分。

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如陶孟和、孙本文、陈达、吴文藻等，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又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他们的研究工作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无论是坚持只有社会调查才能认识、诊断中国问题，还是通过文化和社会心理分析来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无论是研究人口与劳工问题来呼吁人口政策，还是运用“社区研究”方法探索社会单元，都表明社会学者们尝试通过学术工作以应对中国社会的危机。

对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作出重大贡献的费孝通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其早期成果《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探索了富国强民之路，其在乡土中国发展民族工业等主张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可见，虽然视角、主张有所不同，但这些社会学者的研究从出发点到落脚点，无一不是积极地为国之崛起寻找出路，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推动社会政策。所以，从社会学发展传统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的明显分野，同时，由于关注现实之心迫切，社会学者的上下求索也带来了社会学学科的繁荣。可以说，那时的社会学研究是集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于一身，统一于挽救民族危亡、探索富国强民这条共同的主线。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两者之间的分野渐渐明晰，究其原因，两方面因素起了较大的作用：一是自 1957 年始长达 30 年的社会学中断，迫使诸多社会学者不得不终止研究工作，且在重建之后对时政之线敬而远之；二是由于社会学人不断更新换代，新成长起来的社会学人在更为精细的专业分工中走向分散。

#### 探索互惠共存之道

根据布洛维对社会学学科的规范性看法，上述四种类型的社会学可有机结合、互惠共存，每一种类型都从其他类型中得到“活力、意义和想象力”。那么，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能否抛弃分歧，互惠共存呢？

我们能够看到，社会学的发展也正在为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的结合创造条件。比如，影响力日渐扩大的智库建设，越来越多的科研项目化运作，这些机制正在积极引导学术性研究为时政性研究提供支持，“学以致用”的研究传统愈发明显。

在此基础上，仍然需要强调的是，结合二者的优势才是互惠共存的必由之路，抑制其病理学作用，才能更好地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具体来说，如下几点可供参考。

一方面，维护知识共同体的独立性。时政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病理学机制在于，研究成果可能会受到资助方的影响。而保持科学精神，用理性的方式看待研究对象，将一定程度上克服时政性研究的病理学。指出治乱兴衰的背后逻辑，是时政性研究的时代担当，而这些全都有赖于知识共同体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追求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到郑杭生的“理论自觉”，我们都能体会到社会学大师对于自觉性的强调。这种自觉性就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自我定位，是以一种主体性的身份对于自我创新的追求。如此，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学术性研究的病理学，脚踏实地地做好学术性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追求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的互惠共存，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二者杂糅起来，而是在学者们兴趣导向的基础上，加深二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有效沟通。学术性研究可以为时政性研究提供视角、理论和方法，而时政性研究可以为学术性研究提供问题意识、路径探索和试验结果。二者可以相辅相成，相互验证、相互补充，共同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贡献力量。